

导 论

21 世纪头 20 年，是我国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21 世纪上半叶，我们又有着建设全面小康、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因此，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是一个举国、举世瞩目的问题。

在当前世界各国国家利益高度交叉和融合，大国之间对抗和合作同时存在、互有需求，一方不能取代另一方，完全合作不可能、完全对抗也没有出路等新形势下，中国只有坚持和平崛起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牢牢地把握主动权。和平与发展问题，邓小平从未联系起来讲，他讲得是两大战略，中共十三大第一次把和平与发展确定为时代的主题，一直到十六大报告。2003 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提出了高举和平与发展的伟大旗帜。由此，我们开始探索将和平崛起作为中国国际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

为深入批驳“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消除国外对中国发展的疑虑，并找出持续、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政府新一代集体领导十分重视和平崛起课题的研究。2003 年 4 月，在中国海南博鳌论坛上，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同志介绍了和平崛起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同年 10 月，温家宝总理在访美期间发表的讲话中表明中国要走和平崛起道路的坚定信念。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学习会上提出，中国将坚持和平崛起、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2004 年 4 月，在海南博鳌论坛发表的重要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再次指出，中国将坚定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同月，曾庆红同志在上海亚太经社理事会上发表的讲话中亦强调，中国将继续实行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路线方针。

自和平崛起提出后，“中国威胁论”已得到了大大的消解，尤其是在东南亚。我国一系列对外政策取得很大的成功证明，中国和平崛起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国际认同。但和平崛起到底意味着什么，中国对外战略从理念上、

思想上、政策上究竟会发生哪些变化，大国关系究竟如何处理，地区的安全关系究竟如何重新安排，和平崛起和台湾问题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和平崛起是否意味着一定要和平统一，如果不能和平统一，是否就意味着不能和平崛起等等，都是人们关心的重大政治问题。

在新世纪，中国走和平崛起的道路无论是对于中国本身还是对全世界而言，都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无论用什么样的词语来描述和形容中国的发展，中国正在不断地发展和壮大是任何人都难以辩驳的政治现实。中国和平崛起的核心内容是在谋求中国长期、稳定、全面、协调、平衡的可持续发展进程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

中国的发展崛起是过去二十多年改革开放路线的自然延伸。自 1978 年以来，独立、稳定、繁荣和快速发展以及致力于改革开放的中国一直是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和平发展离不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两者互为依托，相得益彰。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仅符合中国的根本国家利益，而且最易为邻国及世界主要大国所接受，从而有助于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和平与发展。贫穷、落后和动荡不已的中国不但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的灾难。

和平崛起是中国未来国家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性课题。从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在大战略的选择上，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面临的最根本问题是国家生存；在邓小平主政时期，中国主要是立足于改革、开放，围绕和平与发展进行初步的战略谋划：对内是致力于改革、稳定和发展，对外是处理好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关系。现在，中国面临的是全面振兴中华的时代，对内是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根本上解决政权内部安全隐患问题和制度创新问题，确保国家立于不败之地；对外是走和平崛起的道路。建国以来，中国对外政策有过四次重大调整。建国初，毛泽东外交政策一边倒；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发生大论战，中美关系大门打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提出“和平发展”的方针，实行全方位外交；“六四”之后，苏东剧变，冷战结束，邓小平提出“20 字”方针。90 年代中期后，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应该有一个新的调整 and 变化。

从根本上来说，和平崛起不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历史是否给它这样一种机遇，取决于时代条件。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如英国、美国等，都是有时代条件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大时代背景下，英国抢得了先机；美国则抓住了帝国主义战争时代造就的历史机遇。和平崛起是全球化时代大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在重要国际战略机遇期内，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

历史的必然。

当今时代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经济全球化，其内涵就是和平与发展。全球化时代与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时代是一个问题的不同表述。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年代，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是中国国家根本利益所在，也事关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平与发展作为客观的发展趋势，是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也不一定在所有的方面、所有的时间都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但从长远来说对中国更为有利。全人类共同利益上升是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必须将自身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相结合作为对外战略的出发点。

中国的发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需要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这种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也是全人类共同利益之所在。任何国家都是将国家利益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依据，中国也是如此。近年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迅猛发展，从两个方面促使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趋于上升。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使各国、特别是各大国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性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国际社会面临着日益增多的诸如恐怖主义、国际犯罪、毒品走私、环境污染、艾滋病等跨国或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这些都是全人类共同利益上升的重要表现。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时代为大国和平崛起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在世界和平受到新的冲击和发展面临新的挑战的形势下，我们应该进一步提高对“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的认识，统一思想，坚定信念，抓住机遇，发展自己。

为此，中国应抛弃狭隘民族主义的国家利益观，将中国人民的利益视为全人类利益的一部分，并努力使两者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这要求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一方面要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也应考虑到其他国家合法的国家利益，并通过扩大与其他国家之间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来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中国将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相结合，既维护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又超出了狭隘的民族利益，从而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①这是中国政府在对国内外形势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科学判断。无论是从中国社会的发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新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8 页。

展历程看，还是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看，能否抓住并尽可能地延长这一战略机遇，对中国实现和平崛起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从中外历史上看，大国崛起往往采取激烈对抗的战争道路，我们选择和平崛起的新道路是由自己的国家性质和国家角色所决定的。从国家特性看，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大国，这三种国家特性集于一身，在现今国际社会是比较特殊的。中国的国家特性决定，我们既寻求崛起、又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同时也追求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理性行为和社会公正与正义的道德诉求。从国际角色看，中国已从自外于国际体系的反对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和改造者，并正在发展成为主要角色，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心地位。这一变化要求我们在现存国际秩序中应该扮演建设者而不是反对者的角色。现行国际体系，如联合国、世贸组织、军备控制和裁军体系等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积极的作用。保持、改造、增强这些行之有效的国际多边合作体制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在今后中国和平崛起的 20 年战略机遇期内，现存国际多边合作机制仍有足够的空间有待于中国去加以开拓和利用。虽然表面上参与的国际多边合作越多，中国的手脚就会受到更多的束缚，但事实上这是一个双向、共赢、互惠的平行方程式。

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负责任的地区大国，中国在参与国际秩序发展过程中应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争取发挥更大作用，只有努力做出应有的贡献，才能在未来各种国际机制变革进程中，尤其是亚太国际新秩序的形成之中逐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几十年来对外开放的实践表明，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现行国际体系是保障中国周边国际环境长期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参与现行国际体系，中国正在迅速地熟悉、掌握现代国家处理国际事务的一整套知识及规则。中国也在根据自身的利益和实力，以确保国际制度的有效性、稳定性、公正性为出发点，对维护现行国际体制的合法地位与权威作用进行渐进式改造。中国在融入国际体系的同时，还要善于学习、运用和改造国际体系，并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发展，促进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

中国怀有和平崛起的良好愿望，但能否成功，并不仅仅取决于中国单方面的努力，国际社会的认同与中国的互动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面对我国的崛起，事实上所有大国和新兴工业国家都不会真心实意地欢迎，都在考虑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包括日、俄、东南亚国家，更不用说美国，这种猜忌和疑虑将伴随着我国和平崛起的全过程。世界力量的分化组合使得我国成为各种力量针对的中心，这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对中国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别的国家有人存在疑虑，也不在于能否完全打消他们的疑虑，关键在于中国

自身能否坚持实行正确的内外政策，即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均衡、可持续发展方针，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实践，通过发展综合国力、全面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等方式融入地区和国际机制，并以此为平台，获取正当利益，在造福中国人民的同时，惠及世界各国。惟其如此，围绕中国发展崛起国际上出现的种种疑虑才会不辩自消。

中国能否和平崛起最大的外部制约因素是美国及其“单极”思维模式，但在与之作斗争时，我们要更讲究“艺术性”，并需要采取与美国主流社会多数人的社会政治主张更为协调的政策。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自然资源日趋短缺，人类需求大大超过全球可持续发展限度和全球生态环境系统向危险的临界点靠近等，要求我们更重视与美国在维护世界能源和环境安全等方面加强合作。我们应和美国一道，努力确保世界各国对淡水、能源、海洋和太空资源的争夺不会威胁到国家间正常关系的发展。我们在继续把对美关系作为我国国际战略的重中之重的同时，在策略手段等方面也要根据新的形势做出相应的调整。因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发展的好坏，中欧战略协调关系能否取得更多的实质性进展等，将对实现中国对美战略目标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牢固树立人类和国际社会不可能被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极端右翼势力拉回到过去“丛林社会”的信念。在同美国交往中，我们更应坚定地要求美国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并向美国指出，从长远看，与各个民族、各种文明、信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和谐相处，妥善处理种种宗教、民族、文化精神碰撞，汲取世界上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合理成分，更符合其根本的国家利益。

台湾问题是和平崛起的最大障碍和国家安全的最大隐患。在经济和平崛起中，推动台湾问题逐步朝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是我们最佳的政策选择。但这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虽然一个国家或地区崛起与否同该国或该地区是否实现了领土和政治统一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必将极大地增进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从国际政治和台海两岸实力对比变化趋势看，我们认为，排除台湾问题的干扰有一定的现实可能性。其一，中美关系现在确实进入了一个稳定的阶段，台湾在中美双边关系中的分量，总体上趋于下降。在美国的战略天平上，中国大陆的分量重于台湾已成定局。其二，国际社会已牢固确立了“一个中国”的基本框架。世界各国普遍看好中国的市场潜力和发展前景，大都希望增进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并认为中国大陆与美国的实力差距越来越趋于接近，大陆与台湾的相对优势将越来越大。台湾问题上国际因素的负面影响趋于减弱，有利于中国进一步营造遏制“台独”的外部环境和舆论氛围。

在目前台湾问题暂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最重要的是不能让它成为干扰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障碍。中国人民都要树立起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心，即实现国家现代化目标是推进祖国统一的关键；国家现代化进程如出现波折或逆转，必将严重削弱大陆对台湾的向心力；只要我们长期保持内部稳定与发展，实现祖国统一只是时间问题。中国和平崛起了，台湾问题最终必定会按照对中国比较有利的方案加以解决，同时，我们还要努力建立国际反“台独”统一战线，以进一步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首先，我们要做好美国的工作，通过推动美国朝野中更多的人士站到反“台独”第一线，把握美台关系中有利于推进反“台独”统一战线的任何变化，从根本上增加台湾所面临的统一压力。其次，我们要争取日本成为国际反“台独”统一战线中的另一个重要的同盟军。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中国要和平崛起、实现统一，除了美国，最为关注的就是日本等中国的近邻国家。因此，中国应尽最大努力搞好中日关系，争取日本与中国一道反对“台独”势力进一步膨胀，危及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日本很难重新成为一个侵略别国的国家，中国也今非昔比，因此，只要日本坚持和平发展方向，把握中日友好大局，我们没有必要过于担心日本军事大国化倾向。从现实和发展趋势看，亚洲出现中日“双雄并立”是大势所趋。只要中国善于捕捉日美战略之间的战略嫌隙，愿意与日本加强合作，共同分享地区主导权，中日两国完全可以实现共存、互利和双赢。

中国和平崛起的核心内容是谋求中国长期、稳定、全面、协调、平衡的可持续发展，为此，我们首先要处理好与美、日、欧主导的现存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体系的关系，通过不断加深中美、中日、中欧之间的相互经济利益联系，克服中国与美、日、欧三大力量之间的政治分歧，缩小相互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对正常国家关系造成的干扰与破坏，妥善解决双边贸易中日益增多的摩擦与争端，共同应对诸如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海洋开发和权益冲突、和平利用太空等超越民族国家和地缘经济范畴的世界经济、政治挑战。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今后，中国在更大范围内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既符合中国的利益，西方也会因此而受益。这是西方国家谋求与中国扩大经济交往的基础。世界各主要力量中心也据此不同程度地开始以中国的政策及发展方向作为其地位战略的定位点。其次，我们要顺应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潮流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下更大的力气，推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挥地区大国作用，通过“强边”使周边诸国搭上中国经济增长的顺风车，更多地分享到中国经济崛起的成果。同时，中国还要不失时机地加大中国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制造

业进行资本和设备投资的力度，通过向外输送中国部分经济部门中明显“过剩”的生产能力，解决国内资源相对不足，突破发达国家的新型贸易保护主义壁垒，缩小南北国家之间正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差距，推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与发展。

在高科技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有组织跨国犯罪和恐怖主义日趋国际化的今天，中国不可能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保障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更不会实现经济的腾飞、民族的崛起。今后 20 年，随着欧洲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进一步扩大，世界贸易组织的最惠国待遇有可能被架空。这将使在建立自由贸易区 and 经济一体化方面落后于欧美的东亚地区（包括中国）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东亚各国只有共同努力，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才有可能积聚足够的经济实力与北美、欧洲抗衡。因此，我们必须顺应大势，推动东亚区域一体化有序向前迈进。

目前，中国经济明显呈现出由“商品短缺”向“经济过剩”过渡的特征，如何扩大“有效需求”，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已越来越突出。解决这一新课题，一方面需要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及市场化改革的力度，以形成适合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要求的产业结构和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必须加快走向世界步伐，通过在全球各地寻找资源与市场，解决制约中国和平崛起面临的诸多困难和一系列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中国企业“走出去”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角度看，这只是中国企业进行世界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中国的跨国经营活动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演化为各国大公司之间的竞争。一个国家能否在积累的国际竞争及国际分工、资源配置、财富分配中占据主动地位，在国际舞台上有没有自己的发言权，关键取决于有没有自己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

因此，我们要转变思路，争取与发展中国家建立新型互利合作关系，并在战略、策略上做出必要调整，主要是：改变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内涵，将重点从单纯的政治支持逐步转向加强新型经济互利合作；针对发展中国家分化的政治现实，采取“区别对待、优先选择”的政策；超越地缘政治，与印度建立新型互利合作经济；区别对待发展中邻国、有重大战略利益的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并对最不发达国家采取“量力而行，先近后远”的政策；中国还必须与非洲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争取在非洲持续发展中有作为。

目前，国际社会围绕伊拉克战争进行的外交和政治较量，客观上促进了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和大国关系的重新分化组合。这扩大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战略回旋余地和国际合作空间。欧盟独立自主性进一步发展，俄罗斯

公开宣布对美国在安理会提出的对伊动武决议使用否决权，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国家集团反对战争等，都是世界多极化趋势的重要表现。这预示着，未来相当长时期美国在战略上面临的各种挑战趋于增多，因而，美国很难将战略重点集中于中国。中国则可以利用这一有利的战略形势加强自己的外交活动，与更多的国家展开各种形式的合作。

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是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中国加入 WTO，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改革开放的法治化和机制化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在国际上发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作用，有助于为国内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并消除一些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减少美国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的战略迫切感，使国际社会更坚定地承认“一个中国”的框架。同时，中国也更容易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国际威望和影响力，使中国能够更加游刃有余地运用合作、协调、对话与斗争等各种手段，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

从长远来看，大国之间构建一个新的国际战略稳定框架已是大势所趋，这种战略稳定框架将是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大国进行战略合作的基础。这种框架应包括安全合作机制、防止军备竞赛机制、预防冲突机制和危机管理机制等。这既能促使美俄进一步裁减核武器，又能牵制美国发展导弹防御系统，还能使中国保持一定的核反击能力。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在 21 世纪的战略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进程也将是中国在国际上和平崛起的过程。当前的国际条件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但道路不会平坦。

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关键是自己要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办好。为此，中国必须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抓。在加快发展经济的同时，努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只有将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中国才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

今后 20 年，中国社会将会进一步多元化和多样化，各种积累起来的社会矛盾将会日益突出，面临的政治改革压力也会越来越大，尤其是中国政府能否及时、稳妥地解决伴随经济水平迅速提高而出现的社会发展滞后，现行法律、法规不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等社会问题，化解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形势不稳定性带来的各种风险等等，都将对中国和平崛起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要如期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目标还取决于能否突破、消除来自外部世界的种种阻力，化解国际经济、政治中客观存在的各种消极、制约因素及不确定性。主要是：

(1) 在国际游戏规则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能不能给中国提供一个和平崛

起的机会，其关键又是美国的态度、美国对外大战略指导思想走向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目标的取舍。在未来的几十年当中，也就是中国希望和平崛起的几十年中，美国对未来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仍会发挥巨大的影响。因此，中国的和平崛起不能寄希望于美国的衰落，否则我们的基础将非常脆弱。基于此，中国一定要坚持维护包括中美两国人民在内的全人类的利益，以便将美国霸权政策可能会对中国和平崛起产生的消极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

(2) 能否同日本在竞争中不断加强双边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妥善处理中日双边关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是中國新时期和平崛起国际战略的试金石。中日两国关系长期处于漂浮不定的状态不利于中国和平崛起。因此，中国应当明确肯定日本是未来的主要战略合作伙伴之一，并将中日两国之间在亚洲的竞争定义为合作伙伴之间的竞争。只要中国国内广大民众能够自觉地克服因过去百年屈辱而在心中存留的悲情和受害意识，并在对外关系方面表现出健康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我们相信，日本人民终究会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不会对日本构成任何威胁，并将给日本带来进一步发展的机遇。

(3) 国际舆论和力量对比是否继续朝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的方向发展。西方国家和中国周边邻国一些人不时地发出“中国威胁论”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与别国不同，并认为中国不民主、不稳定、不好捉摸，一旦时机成熟就会采取非和平手段来增进自身国家利益。对付这些奇谈怪论的最好办法，不是与其纠缠，而是让它们自生自灭。只要中国外交能按照十六大报告提出的新安全观念，真正地关切全人类共同利益，进一步淡化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色彩，不断增加多边色彩，注意提升国际形象，国际舆论和力量对比的天平将继续朝中国一边倾斜。

(4) 世界发展日益失衡，不可再生资源日趋匮乏和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日盛等消极因素能否得到更有效制约。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受到的来自世界市场发展不平衡、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短缺和美欧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日益增加等不利因素的制约也越来越大。怎样才能在不损害世界自然生态环境、保证世界市场正常运转的条件下解决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对中国和平崛起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挑战。

(5) 中国的“与邻为伴，与邻为善”及一系列“安邻、助邻、扶邻、富邻”举措，能否落到实处，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和平崛起要取得顺利进展，离不开近邻国家的支持与合作。因此，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强盛，我们应进一步加强睦邻友好政策的力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多拿出一些经济资源，帮助近邻国家。在推进与周边国家经济合作的进程中，中国既要更多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又要时时注意克服不健康的民族自大心理和大国心

态，自觉地抵制中国中心论。

(6) 中国能否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地区大国，为世界和平、稳定和经济、社会、文化繁荣提供更多的有形、无形公共产品，也会间接影响和平崛起进程的顺利发展。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亚非拉一些中小国家对中国的期望值在提高。这些国家希望中国能为其发展做出更多的精神和物质贡献。这在战略上是中国的一笔宝贵的资产。为取得这些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支持与合作，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应在国际人权、民主化斗争方面，学会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来行事，以改进和提升中国在这些国家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同时，为从根本上增强对世界的吸引力，中国还需要在一些国际安全问题上进一步增加政策透明度，坚持以说服、谈判、协商，总之是一种更温和的方式来处理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关系。

最后，中国能否具备强烈的机遇意识和宏观的战略思维能力，通过建立各种行之有效的创新机制，将科技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按照合理主义的经济原则，与世界能源和矿业资源蕴藏大国建立长期稳固的战略合作关系（如充分利用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天然气以及俄罗斯西伯利亚的自然资源等）等，都将对中国和平崛起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第 1 章

中国和平崛起与重要 战略机遇期

中国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全力推进现代化建设，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为中国和平崛起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①这是中国政府在对国内外形势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科学判断。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中国和平崛起至关重要。世界处于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了根本的前提条件和现实可能性。邓小平曾语重心长地说，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②如果中国能够抓住和用好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到 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两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到 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那么中国就能实现和平崛起。中国走和平崛起道路具有极大的时代意义，符合时代潮流，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新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转引自刘华秋文章：《既必须紧紧抓住又可以大有作为——谈“重要战略机遇期”》，《人民日报》2003 年 4 月 14 日第 9 版。

一、中国走和平崛起道路符合世界时代潮流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① 这是在对世界形势进行了全面深刻分析基础上得出的科学论断。时代主题是大势所趋，具有客观性。全世界人民求和平、争发展是不可阻挡的主要历史潮流。现在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一个也未得到根本解决，因此和平与发展又是我们必须追求的目标。中国走和平崛起道路正是顺应了这一潮流。同时，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观是中国走和平崛起道路的思想基础。

当前，尽管世界上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因素在上升，但国际关系中多种矛盾和利益交织，决定了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的潮流是曲折前行的。

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和平离不开发展，发展需要和平，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没有世界各国协调、平衡、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就难以实现持久的世界和平与安全。正如邓小平所强调：“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② “9·11”事件后，美国一些人认识到，产生恐怖主义的一个根源是“失败国家”。但他们没有深入研究这些国家落到这种状态的根本原因。而实际上这些所谓的“失败国家”是某些被发达国家边缘化或抛弃的发展中国家。对它们的这种状况，发达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另一方面，虽然发展是硬道理，但只有在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中，各国的经济才能得到发展。和平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邓小平说：“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争取和平是世界人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8 页。

^② 中国外交部编写组：《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6 页。

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①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集中精力进行国内经济建设，甚至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有付之东流的危险。

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中国实施和平崛起战略的大背景。

1. 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相互依存的深度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新的科技革命：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能源技术和纳米技术等为代表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科技创新出现群体突破态势，新的技术群和新的产业群蓬勃发展；科学技术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密集创新时代；许多重大创新出现在学科交叉领域，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互渗透。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技术更新速度日益加快；科技与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等的联系日益紧密。

同时，发达国家进入了知识经济的新阶段，发展中国家正在现代化道路上赶超。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两股潮流发展的结果，导致了一种新经济的形成。现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 50% 以上来自知识密集型产业。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和生产要素，既不是农业经济时代的土地和劳动，也不是工业经济时代的有形资本，而是知识。知识正成为诸生产要素中最具活力、最重要的因素，是联系、组织、带动更新其他要素的核心，知识经济的社会形态正在成为现实，综合国力竞争成为各国之间斗争与合作的主要内容。这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

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在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结构变革的同时，还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行为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活动，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是世界各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和融合的表现。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经济全球化呈现出全方位发展的态势。世界各国之间、各地区之间在经济、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依存大大加深，经济间相互流通的障碍不断减弱，经济融合的需求在日益加强。二战后初期，世界贸易额仅为 500 多亿美元。而到 2000 年，世界货物贸易总额近 6.2 万亿美元，世界服务贸易总额达 1.4 万亿美元，两项相加总额已高达 7.6 亿

^① 中国外交部编写组：《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6 页。

美元。^① 世界经济正在逐渐真正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全球市场加速形成，区域一体化蓬勃发展，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达到了空前程度。

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使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性上升，共同利益增加。它们更加愿意通过对话、谈判等和平手段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这在总体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2. 大国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当前，国际形势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共同利益不断增加，相互合作与协调利益的要求上升。它们已互不为敌手，相互间以暴力手段解决争端的可能性大为减少。大国间“零和”规则正日益为“共赢”模式所取代。与以往相比各大国在对付非传统安全威胁、解决地区热点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方面更加注重合作。国际政治中传统的地缘政治重要性趋于下降，地缘经济、国际机制协调的作用趋于增强。

“9·11”事件以来，国际战略形势还出现了以下新特点：首先，非国家行为体挑战主权国家成为影响国际战略形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在国际安全和政治领域最突出的是恐怖主义。其次，非传统安全威胁，特别是恐怖主义在国际上的影响愈益突出起来。再次，非对称性战争成为战争的主要形式之一，以美军为主的联军与塔利班和本·拉登进行的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实际上就是这种形式的战争。国际战略形势的这些新特点促使大国进一步加强合作，以应对面临的共同威胁和挑战。

“9·11”事件后，世界各国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都严厉谴责恐怖主义，在反恐问题上表现出空前的一致。世界各国在全球反恐斗争中加强合作，表现了国际社会打击恐怖主义的强烈意愿和坚定决心。同时，反恐合作已成为大国之间新的战略利益交汇点。在大国关系中，对抗的因素大大减少，合作协调的因素有所增加。大国之间既相互借重、又相互制约，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态势和突出特点。单边主义政策和单极世界构想，遭到许多国家的批评和抵制。大国之间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为它们构建相互之间新的战略稳定框架创造了良好条件。

美国在“9·11”事件后，也认识到了大国合作的重要性。布什总统说：“我们得到了百年不遇的最佳时机，建设一个各大国之间和平合作、不再持续备战的世界”；大国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之间在这个世界上的

世界贸易组织：《2000年世界贸易组织年报》第18页。

武装冲突是可以避免的”，美国获得的最大机遇是建立维护人类自由的世界均势”。^①2002年9月20日发表的布什政府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今天世界大国发现我们站在同一边——联合起来对付恐怖主义、暴力和混乱的危险”，我们将用在大国之间建立良好关系的方法来维护和平”。^②这表明，布什政府愿意与其他大国合作，建立保持世界和平的框架。

中国与俄罗斯1996年决定建立和发展两国“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种“战略伙伴关系”与冷战时期的“盟友关系”或“战略合作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不针对第三国、不带结盟性质，其主旨是不搞对抗，相互友好，加强合作。这种关系是平等的、相互尊重的，同时又不具有排他性。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中两国“向世界显示了一种新的国家关系模式”。^③2003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俄罗斯，两国国家元首一致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深化中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和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都将是两国外交政策的战略优先方向。^④俄罗斯对建立未来大国战略稳定框架也有自己的思考。2002年6月，普京总统主张，美、中、俄三国应共同形成“稳定弧形”。^⑤他还提出建立由北约、独联体集体安全体系和上海合作组织组成的“稳定弧形区”。^⑥

3. 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制约了霸权主义

现行国际体制和国际法则承认各国主权平等，为国际关系民主化创造了前提。国际关系民主化已成为世界上的主要潮流之一。广大中小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要力量。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与世界多极化趋势相互呼应，成为制约美国“单极化”战略的有利因素。

① U.S.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The Assurance of Freedom*, *New York Time*, September 12, 2002.

②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September 20, 2002, <http://www.whitehouse.gov/nsc/>

③ [俄] 普京2002年7月6日在圣彼得堡接待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时的讲话，载 *The Russia Issues, Com*, <http://www.yahoo.com>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2003年5月27日在莫斯科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文汇报》2003年5月29日，第1版。

⑤ [俄] 普京2002年5月20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载 *The Russia Issues, Com*, <http://www.yahoo.com>

⑥ [俄] 普京2002年6月6日在会见《人民日报》记者时的谈话，见 Natalia Alekseyeva 文章：*From Triangle to Arc*，载 *The Russia Issues, Com*, <http://www.yahoo.com>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或“超强国”，并企图长期维持其“一超独霸”的地位和实现“单极世界”。与此同时，世界多极化的趋势虽然遭遇艰难曲折，但仍继续向前发展。

美国作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既有促进和平与发展的积极作用，又有推行霸权主义的消极影响。一方面，美国在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向某些国家提供援助等领域的一些作为，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稳定与经济成长。另一方面，美国推行“单边主义”政策和“先发制人”军事战略，甚至鼓吹具有强权色彩的“新帝国论”，对地区和平与稳定投下了阴影。

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形成了制约。虽然美国到 2015 年仍将保持其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但美国并非万能。它难以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事情上主导一切。

事实上，美国面临着世界多极化趋势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越来越大的制约。例如，在伊拉克问题上，法、德、俄等国公开反对美国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对伊动武，世界各国人民举行了反对美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美国也无法任意操纵联合国通过它想要的决议。

美国的军事力量作用也很有限。如美国能很快占领了伊拉克，但却不能在短时间内消除伊拉克境内游击战形式的抵抗，实现伊拉克的稳定和重建。

此外，美国搞霸权主义还受到国内各种因素的制约。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和推行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在国内遭到许多批评。而且美国一些人士还认为，美国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在 2015 年后将遭遇严重挑战。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认为，15 年后“欧盟和中国将是主角。在正常情况下，俄罗斯将东山再起，印度可能会崛起成为一个有影响的角色。长期趋势无疑是朝着这几个大国的力量进一步平衡、美国优势下降的方向发展。美国的相对实力将逐渐削弱。美国将不再有掌管整个世界的意愿，整个世界也将越来越不能容忍美国的这种图谋”。^①

4. 各种类型、不同层次的国际合作机制正在发展

目前，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主体大大增加，除了国家之外，还有国际组

美国《洛杉矶时报》国际辛迪加《全球视点》专栏对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采访录：《正在形成的另一种世界新秩序：美国外交政策专家预测布什执政期间及其后的全球强权政治前景》，载《曼谷邮报》2001 年 1 月 28 日。

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乃至个人，其活动领域不断扩大，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上升。各种类型、不同层次的国际合作机制空前活跃。

在各种国际合作机制中，区域性合作趋势方兴未艾，值得特别重视。区域性合作是在全球化趋势背景下发展的，实际上是通向全球化的一个阶段。当前的区域性合作呈现如下特点：

(1) 逐渐形成欧洲、美洲、东亚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安全合作。

欧洲、美洲、东亚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安全合作的发展是世界战略格局走向多极化的重要表现之一。

欧洲联盟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已与美国不相上下，它的继续东扩已是大势所趋。目前等候入盟的国家共有 13~15 个，预计这个过程将延续到 2010 年甚至更晚，今后十年将是欧盟实现东扩和深化的十年。届时，欧盟成员国将翻一番，由目前的 15 国增加到 28 个甚至 30 个，人口将由目前的 2.6 亿增至 5 亿。这将进一步奠定欧盟在欧洲的中心地位，并使欧盟在全球范围内的分量显著增强。当前，欧洲国家正在欧洲联盟的框架内加速推动独立的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最终形成，包括建立适当的磋商与决策机制，以及必要的、自主的军事手段和军事能力。欧盟已在 2003 年组建欧洲快速反应部队。欧洲国家在防务上独立自主因素的发展将对欧洲未来安全格局的形成有重大影响，也是世界朝多极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

1994 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区虽然仅侧重于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之间减免关税，在经济一体化五种形式中处于较低水平，但由于美国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实力，该自由贸易区在世界上的影响不亚于欧洲一体化。而且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已同意将北美自由贸易区扩大到中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在 2005 年之前结束关于成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

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安全合作进程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强劲。1997 年的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深感加强地区经济合作和共同发展的必要性，东盟 + 3（即 10 + 3）机制和东盟 + 1（即 10 + 1）机制的建立正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自 1997 年 12 月起，每年举行东盟 - 中国、日本、韩国（东盟 + 3）首脑非正式会晤和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分别举行的首脑非正式会晤，即三个东盟 + 1。1999 年 11 月 28 日，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 + 3 领导人会议就东亚合作发表联合声明。在该声明中，领导人一致认为：“将继续进行对话、协调与合作，加强相互理解与信任，从而在东亚建立持久的和平与稳定” 2000 年 7 月，在东盟地区论坛举行期间，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东盟 + 3）首次举行外长级正式会谈，讨论加强经济合作问题。2003 年 10 月，中国政府领导人在“10 + 3”会议上倡议，“10 + 3”应深化经济和金融